

法治中国历程

——组织生态学视角下的法学教育(1949 - 2012)

刘子曦

提要:建国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机构在发展速度上有着极大波动,但鲜有系统数据和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一变化轨迹背后的动力机制。笔者收集了64年中,本科法学教育组织生命史数据,引入组织生态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影响法学教育发展速度的因素。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本文指出:首先,法学教育组织的成立率与这一组织种群的密度呈钟形曲线关系,种群规模的变化显著影响组织的成立率;其次,在考虑种群演变的动力机制后,组织环境的容纳能力对法学教育机构的成立率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群体层面的组织过程可能是连接经济发展与法学教育扩张的重要因素;最后,制度环境的变化显著影响法学教育组织的成立率,法律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是该环境中的关键力量。

关键词:法学教育 组织生态 种群密度 制度环境

一、问题的提出

建国以来,法学教育^①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从20世纪50、60年代几近灭绝到70、80年代缓步复苏,如今的中国法学教育已经一片蓬勃。近20年来,法学成了热门专业,法学院系也广泛见于各高等教育机构中。法学教育扩张的步伐之快,从近年

① 本文中所指的法学教育为全日制大学本科中的法学专业教育,其开展于各高等教育机构的法学院系中。法学专业本科生接受四年制法律知识与技术的培训,毕业后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专科学校和本科学校中的专科专业(如法律事务)则不在笔者的研究范围之内。笔者将专科学校中的法律相关专业剥离开,有两重考虑。首先,大专院校中开设的“法律事务”专业(或其他法律职业类专业)虽然也涉及法律知识的传播,但和“本科法学专业”的教育目标存在一定差异。如,更注重培养学生适应司法文秘以及司法行政辅助管理等实际工作。因此,本专科教育组织需要动员的资源 and 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可能存在差别。其次,由于资料限制,系统收集专科专业的数据暂时难以实现,只能留待日后进行专门研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专科法律专业可以被忽略。相反,一些专科学校(比如一些省份的司法学校和警察高等专科学校),不仅在法学教育中历史悠久,而且是非常活跃的法律教育机构,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价值。

来其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中便可见一斑(姚植兴,2007;李国荣,2009)。这一急剧变化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与1980年相比,2012年以“法学教育”为题的论文增长了105倍。^①大量文献涉及中国法学教育的变化轨迹和发展趋势,却鲜有深入剖析之作品。与不断增长的讨论热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系统性数据的匮乏、分析性统计的缺失和理论化的不足。

第一个问题涉及研究的实证性,即数据。大多数文献没有通过描述统计去刻画法学教育的长期发展,而是笼统地一言以蔽之,或以背景性信息的笔调匆匆带过(符启林,2007;戚桂芳、袁雪,2009;冀祥德,2010)。即使引用相关数据,也多是碎片化或点状化的(李龙、邝少明,1999;李龙,2000;付子堂、周祖成,2006),难以展现法学教育在复杂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发生的连续性变化。如何将其量化、系统化仍然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研究的精确性。不少学者归纳了法学教育的历史性转变,并指出形塑这些转变的一些社会因素,如市场经济的发展(杨振山,2000;周守伦,1995),高等教育的扩张(陈伟华,2010;李仁玉、张龙,2010)和依法治国政策的出台(李龙,2002;孙国祥、张书琴,2009;于丽英等,2011)。然而,学者们建立的往往是未经检验的相关关系,而非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因果联系。同时,文献所关注的“发展趋势”未将“增长方向”(正/负)和“增长速率”(快/慢)区分开来。而两者间的分别恰恰关系到结构性因素对法学教育的影响模式究竟为何。例如,经济发展有可能促进法学教育机构^②在总量上的持续增长,却可能对某一时间点后的增长速率产生抑制作用(threshold effect)。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学教育的发展速率,^③它们是否具有独立的作用,其作用是否能解释跨越60年的变化趋势,以及连结它们与法学教育的微观机制是什么,我们很难在既有文献中找到这

① 该数据来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② 法学教育机构(组织)的甄别标准是国家教育部授权开设法学专业的资格。同一大学内有多个法学院(系),则只计一次。如,中国政法大学内有多个法学院但只记为一个法学教育机构。并且,一个大学内如无独立的法学院(系)却拥有本科法学专业开设资格则也记为一个法学教育机构。如,石家庄学院并无法律系,但在政法系下开设本科法学专业,则也记为一个法学教育机构。

③ 本文将法学教育发展速度定义为法学教育组织(机构),如每一年法学院(系)成立率(founding rates of legal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后文提到的法学教育的发展速度皆遵循该定义。

些问题的答案。第三个问题涉及研究的深度。探讨法学教育的语境多为政策或教育实践分析,重点在提出应然性的建议,而非进行实然性的论述。理论框架和概念在此种语境下常被忽略,社会学视角也颇为鲜见。但法学教育并不等同于教育技术、专业知识抑或政策延展,它是一种相对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也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理解法学教育的社会学性质,有助于我们找出决定其发展速度的结构性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的关系。在此种意义上,社会学分析对推进法学教育研究裨益良多。

以上三个问题相互影响,使得针对法学教育的探讨难以突破揣测和泛泛之谈,进而走向严谨的社会学实证分析。基于此,笔者以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作为理论基础,以年为单位,收集中国法学教育机构(1949-2012年)成立率^①的长期数据。同时笔者关注宏观经济环境等相关变量在该时段中的连续性变化,以期找出决定性的社会力量。文章采用负二项回归(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统计模型分析法学教育发展速度的影响因素,在检验既有经验命题的同时,指出组织的“密度依赖”(density dependency)这一动力机制的重要作用。下面,笔者将首先回顾组织生态学理论以及该理论与法学教育机构成立率的关联所在。

二、组织生态学:组织成立率的理论框架

1970年代,组织社会学领域发生了较大的理论转向。60年代占据话语优势的理性主义路径(rationalist approach)逐渐瓦解,其关注组织内部运行而忽略外部环境的研究取向遭到批判。组织不再被视为依靠调整相对封闭的内部体系(close system)和管理行为来缓冲市场影响的个体行动者,而被视为组织环境下的开放系统(open system)(Hassard,1995),其重要标志在于:组织间的联系、组织与外部环境间

^① 组织成立率(rates of organizational founding/organizational founding rates)是指某一组织种群中,新组织的成立速率,即有多少个组织成立(Hannan & Freeman,1984)。“组织成立率”对应的是计数资料(count data),而非百分比。此概念为组织生态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定义方式也已成为共识。笔者对这一概念的中文表述参考了台湾学者郭国泰的翻译(郭国泰,2006:35)。

的关系、组织形式的改变开始得到重视(Dobbin,1994)。核心问题不再是“个体组织如何适应市场要求”,而是“组织在群体层面的演变机制”,如:组织同形或组织形式在群体中的传播(diffusion)。组织生态学参与并引导了这一学术话语的转变。

(一)种群与生态过程

1977年罕南与弗里曼基于生态学与人口学理论,提出组织嵌入于组织群体这一关键的环境当中,并将其概念化为“种群”(population)(Hannan & Freeman,1977)。他们指出,种群内和种群间存在竞争、选择和淘汰过程,类似于自然界中的“物竞天择”。每一个组织和种群都有其生存周期,而组织研究者需要关注的是“决定组织成立和消亡”的因素与条件(Singh & Lumsden,1990)。组织与种群存在双向互动。一方面,组织处于种群的内生性动力之下,它的生命周期受到种群密度(population density)的强烈影响(Delacroix & Carroll,1983)。换句话说,根据种群内既存组织的数量,可以预测下一个时间段中,新组织的“出生率”和旧组织的“死亡率”。另一方面,群体动力随着组织的进入与退出不断变化。换句话说,上一个时间段中,新近成立或消亡的组织数量直接影响下一个时间段中的种群密度。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被称为组织的“生态过程”。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组织生态学发展迅速,其理论学说和经验研究进一步丰富。研究者以“组织死亡率”和“组织成立率”为主题,逐渐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阵营(Amburgey & Rao,1996)。

前者主要关注组织的“人口学过程”(demographic processes),即以种群内的竞争与选择机制、种群内部资源分配的结构和特点来解释组织的年龄(Hannan & Freeman,1984)、规模(Aldrich & Auster,1986)、生态位宽度(niche width)(Carroll,1985)与组织死亡率之间的关系(Baum & Christine,1996)。这三种关系又发展成为结构惰性理论^①(structural

^① 笔者将组织年龄和规模与组织死亡率之间的关系一并归入结构惰性这一主题之下。该主题具体包括:1. 新兴组织的死亡倾向(liability of newness);2. 小规模组织的死亡倾向(liability of smallness);3. 中期组织的死亡倾向(liability of adolescence)。具体参见Bruderl & Schussler,1990。

inertia)和生态位^①理论(niche and fitness)。

后者主要关注组织的“群体动力”(population dynamics)和“密度依赖”(density dependence)。群体动力是指,种群内既存组织的成立或消亡模式会对今后的模式产生影响,因为成立率的提高对潜在的组织行动者是一种鼓励性的信号,会导致更多组织进入种群。随着成立率的进一步增长,资源竞争开始加剧,组织的死亡率升高。这对处于观望中的组织行动者来说是个负面信号,有可能代表了组织环境的恶化或现行组织形式缺乏合法性。然而,种群中组织的死亡会释放出部分资源,当这部分新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也有可能对下一个时段的潜在行动者产生吸引。鉴于群体动力学说的核心观点已被吸纳进密度依赖理论,笔者将在下文着重介绍后者。

(二)组织成立与密度依赖

密度依赖与群体动力的原理相似,但考量更为复杂,融合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传统并发展出“种群的制度合法性”(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of a population)这一新概念。密度依赖是指,在种群形成初期,其规模的增加会提升种群的制度合法性,有利于其成员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当一个组织群体扩展到一定程度,则会被认为无可取代或不可或缺,这种合理性(taken-for-grantedness)会提升整个群体的生存状况,降低既存成员的死亡率,同时吸引更多行动者进入种群。然而,随着种群规模的持续膨胀,竞争机制产生的抑制作用会渐渐超过合法性带来的促进作用。在种群演变的后期,特别是当组织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对稳定时,由竞争产生的效应会愈加明显,留给新生组织的空间越来越小,组织的成立率也会相应下降。简而言之,种群发展初期,合法性效应占据主导,而后期,竞争性效应占据主导(见图1)。组织成立率与种群密度呈现出一种历时性的动态过程,在统计模型中则显示为倒U型(或钟形)曲线(Hannan & Freeman, 1987)。当然,合法性效应和竞争性效应的具体形成也涉及文化和权力的作用。例如,组织成立在宏观层面是时间点上发生的抽象事件,但在微观层面是具体的资源与话语的动

^① 针对生态位与组织死亡率发展出:资源划分(resource partitioning)和适合性(fitness set)两个研究主题。笔者将其合并为生态位理论,因为两者都由关于“生态位宽度”和“种群内部的选择过程”的论述衍生而来。具体参见 Hannan & Freeman, 1977; Carroll, 1987。

员过程。行动者需要证明自身组织形式的合理性和成立的必要性,也要建立关系网,联系相关主体,学习组织运行的有关知识和技术。而种群的规模本身即简化了这一动员过程,既赋予新组织以合法身份,也提供了可供利用的关系网络和信息(Marrett,1980)。再如,在群体层面,竞争效应源于组织间抽象化的资源竞合关系,而在微观层面上,则具体化为组织和潜在行动者间多样的权力斗争模式。在种群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组织成员会成立各类专业协会,设置更高的门槛来限制未来的竞争者的涌入(Nownes,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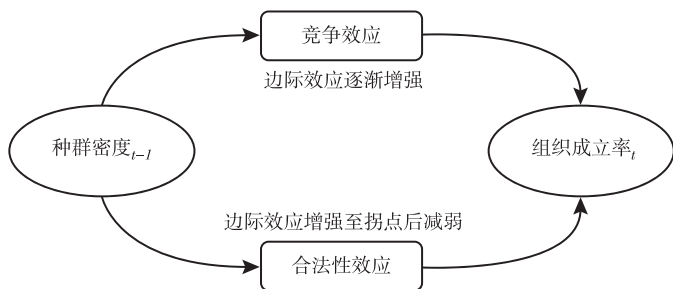


图1 种群密度的作用原理

(三) 组织成立与制度因素

与组织生态学同时崛起的另一理论流派是新制度主义。后者强调组织嵌入于“制度环境”当中,而制度环境又由各种文化图示(cultural schema)、政治政策和社会规范组成(Scott,2008)。现代组织是文化与政治力量的产物,而非为满足经济效率的理性设计。在制度压力下,组织自觉地将制度要求融入自身结构中,以谋求其身份的合法性(Meyer & Rowan,1977)。合法性而非效率是正式组织得以存活的关键(Meyer,1980)。通过强制、模仿与社会规范机制,个体行动者会转向最具合法性的组织形式,将其融入到自身的正式结构中,从而出现集体性的制度同形现象(DiMaggio & Powell,1983)。组织并非理性地设计着最优形式,而是依靠制度环境来理解“何种形式是理性的或恰当的”(DiMaggio & Powell,1991)。

80年代末期,组织生态学开始融合新制度主义有关制度环境与合

法性的论述,逐渐摒弃了早期注重竞争机制而轻视社会文化力量的研究路径。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研究者对“制度因素如何影响种群生态过程”的关注中(见图2)。^① 第一种关注方式是将制度环境当作与组织生态平行的社会力量进行考察。例如,基于对多伦多市社会服务组织在12年中的生命史数据,塔克和他的同事把制度环境和种群生态过程当作两组独立变量,考察其对志愿组织成立、消亡率的效应。结果肯定了两种力量各有显著效应(Tucker et al., 1988)。在跟进研究中,他们进一步分析了两种效应和行业类型(specialists and generalists)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种效应对专业性组织的影响大于综合性组织(Tucker et al., 1990)。第二种关注方式将制度性因素内置于密度依赖的作用过程中,观察密度变化与组织合法性间的双向影响,即合法性效应在种群演变过程中的角色。上一段已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加赘述。合法性效应已在多个行业背景下得到验证。例如,罕南和弗里曼分析了美国工会在1836-1985年的成立率变化,发现在工会行业发展的早期,种群密度每增加一个单位都会显著促进工会的合法化与制度化,进而显著提升未来新组织的成立率。但这种促进作用的边际效用逐渐放缓,直至被竞争效应覆盖(Hannan & Freeman,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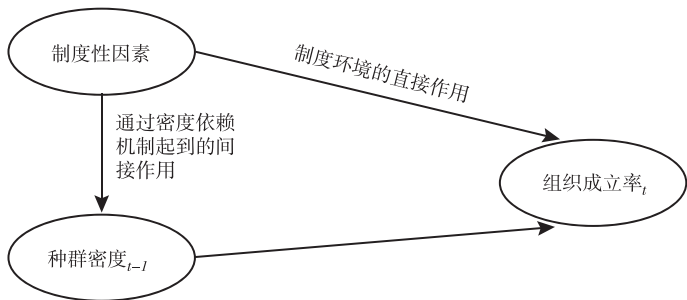


图2 制度性因素对组织成立率的作用路径

(四) 制度环境的构成与维度

组织生态学派与新制度主义的融合缘起于后者对前者的质疑。20

^① 组织生态学与新制度主义的结合也体现在“群体层面的动力机制如何带动制度变迁”这一论题上。但针对该主题的研究实为少数。多数研究者只是在论述“制度环境影响生态过程”时简要提及而已(比如 Hannan & Freeman, 1988)。

世纪 80 年代末期,祖克尔撰文批评组织生态学研究并未直接测量“合法性”这一影响族群生长和死亡率的重要概念。同时,她也指出,外在于组织的制度环境这一社会力量并未得到组织生态学的充分重视,这种忽视与迈耶等人的研究结论形成了鲜明对比(Zucker,1989)。因为,在新制度主义组织研究者看来,服从“社会规范和制度环境对于组织的期望”是提高组织成活率、加快组织形式扩散速度的关键(Meyer & Rowan,1977)。适应制度环境为组织提供了更加稳固的身份和地位(Galaskiewicz,1985)以及更多的资源(Pfeffer & Salancik,1978)。祖克尔的批评促使组织生态学派对“制度环境”重新进行变量化与测量。这种努力以鲍姆和克里斯汀对多伦多市日托中心的研究为代表(Baum & Christine,1992)。在该研究中,他们反思了制度环境在经验研究中的缺位,并提出通过测量组织族群的“关系密度”(relational density)来模拟制度环境对组织的作用。具体的操作即统计历年来该族群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签订了多少服务购买协议,以此评价组织和制度环境的契合度。至此,以“组织间关系网络来模拟制度环境”的方式被广泛采纳(Audia et al.,2006)。但组织间的关系网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准确地测量制度环境则是值得商榷的。换句话说,一方面,关系网络所传递的更多是资源支持而非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这一变量化过程可能过分简化了制度环境的复杂维度。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至少包含三个维度:规则的(regulatory)、规范的(normative)和认知的(cognitive)。规则以法律法规为代表,规范以社会规范或惯例为代表,而认知则以话语与文化为代表(Scott,2008:51-71)。三者中,认知维度最为重要,是构建社会事实和行为意义的核心,正如伯格和凯尔纳所言:“每一种人类制度都是一种意义的沉积和意义的物化形式”(Berger & Kellner,1981:13)。而这种文化意义上的物化则主要指话语、仪式、符号表征(Jepperson & Swidler,1994)。因此,透过话语,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制度的文化认知维度。制度深入人心、渗入组织环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会反复被提及,成为日常话语与词库的一部分,成为现象学意义上无需反思的事实。

不过,对于组织生态学而言,多维度测量组织的制度环境仍需推进,因为大部分研究仍然采用单一维度考察制度环境,如立法数量、法律法规对某种组织形式的支持程度(Renzulli,2005)或组织间关系网(Burns & Wholey,1993;Goes & Park,1997)。在本文中,笔者将尝试从

“规范性”和“认知性”双重维度来理解法学教育组织所面对的制度环境。具体操作化为：一方面，测量历年来出台的法律数量，另一方面测量法治话题在公共话语中的重要程度。

三、法学教育组织成立率的决定性因素

总结前文，组织生态学善于分析组织群体在较长时段中的演变过程，其中，影响组织成立率的关键变量是密度依赖与制度环境。鉴于组织生态学早期以研究商业组织见长，曾有学者质疑教育组织作为典型的制度性组织是否适用于组织生态学模型，并提出族群生态对组织成立率起作用的主要条件是经典的市场环境，即自由竞争缺乏政府管理（Perrow, 1986），虽然一些经验研究证明了这种适用性（Nielsen & Hannan, 1977；Carroll, 1981；Baum & Christine, 1992），但却甚少探讨密度依赖机制在高等教育组织群体中的作用。还有学者指出虽然种群规模的确影响着学校的成立率，但两者间是线性而非倒 U 型曲线关系（Renzulli, 2005）。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组织生态学，特别是密度依赖机制，与高等教育组织群体的关系。这样可以检验组织生态模型的适用性，也为理论提供了修正的可能性。^①另外，中国高教集中型的体制特点便于评测“组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制度环境”对高校种群演变的影响，因为无论是资源还是制度都以中央统筹为主，在全国范围内的作用比较一致，可以构成整体性的组织环境和制度环境。集中型的体制特点并非指中央政府以审批的方式决定教育组织的成立，而是指各地方高校处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法律、政策框架下，会将彼此看成统一体系下的行动者，这是构成一个组织种群的基础和前提。这一点也是组织生态学研究在中国背景和美国背景下的重要不同。美国的经济政治体系决定了其教育机构主要嵌入于地方（尤其是州）的

^① 中国的教育领域与商业企业之间的确存在不同。商业企业的“死亡”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合并与收购，第二种是彻底退出市场。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教育组织的死亡存在两种形态并存的情况。改革开放后以第一种形态为主。因此，这并不意味着组织的死亡率为零。组织生态学者认为，种群生态模型适用于所有领域。但这一命题并非不证自明。在考虑了教育组织的相对特殊性后，该命题是否还能够成立，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解释力，这些问题对整个组织生态学的理论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环境中。州和州的法律、资源情况差异很大。研究者在分析教育组织环境因素时,主要以州为观察对象,将一个州内的组织当成一个组织族群,将州的立法状况当作最为重要的制度环境,相对忽略全国范围的环境变化(Renzulli,2005)。而中国社会高教体系的特点要求研究者充分考虑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这也是笔者将法学教育组织视为全国范围内构成的一个组织群体、并收集该层面相关数据的原因。最后,笔者认为,组织生态学视角将有益于我们思考中国法学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原因有三。首先,这一视角有别于建立于粗略的历史回顾之上的归因。关于组织群体的系统的的数据,将“增长”这个模糊概念细致化为“增长得多快”,将“质性的描述”转变为“定量的分析”。而这种准确性、系统性恰恰对制定法学教育的宏观蓝图、相关政策必不可缺。第二,因为该视角将组织成立和历时性的群体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准确看到在哪一个阶段法学教育进入高速发展,哪一个时段出现瓶颈状态;同时预测,在既有的资源承载能力下,组织族群未来的发展趋势。这种精确到时间段的分析有益于法学界进一步讨论“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这些关键的议题。第三,不少法学文献富有见地地指出当代影响法学教育扩展的因素,如市场经济(霍宪丹,2003;冀祥德,2010)、权利时代(汪习根,2001;张文显,2005)、依法治国战略决策(董志峰,2008;任丹红、王国梁,2007)等。但怎样在这些结构性因素与法学教育发展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联系是否透过组织族群吸引或排斥未来的组织行动者还未得到考察。以下,笔者将在理论与文献的基础上,以中国的法学教育为具体的研究情景,提出假设。

假设1:密度依赖假设。法学教育的规模,对新机构的成立率有正向影响。但这种正向影响的边际效应,随密度的持续增长而减弱。“种群密度”,即上一年有多少个既有的法学教育机构,与“组织成立率”,即下一年有多少法学院系成立,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成立率是种群密度的非单调函数(nonmonotonic functions)。为了模拟这种函数关系,种群密度的平方^①也作为自变量被加入进来。

由假设1形成以下分假设。

① 组织生态学预测:组织成立率随种群密度而增加,但该增长的速率越来越缓。加入密度的平方项是组织生态学研究基于尤尔模型(Yule model)以模拟倒U型曲线后半段而做出的技术性尝试。因为,成立率的一阶导数与种群密度正相关,但它的二阶导数则为负相关(具体参见 Hannan & Freeman,1986)。

假设 1a: 全国法学教育机构的总数与法学院系的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 1b: 全国法学教育机构的总数的平方与法学院系的成立率呈负相关。

假设 2: 资源依赖假设。资源和组织成立率之间存在供给关系。当组织环境的承载能力增强, 其容纳新组织的空间也会扩展, 同时, 种群内部的资源争夺也会减弱。因此, 组织的成立率也会增长。法学教育机构的组织环境主要由三个彼此相关的部分组成: 经济资源、人口资源和消费者资源。市场经济愈活跃, 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也就越强, 而经济资源又会扩大高等教育的消费者群体, 也变相地拉动了法学教育的扩展。人口增长一方面扩展了法学教育的潜在消费者群体, 另一方面带来更强的社会冲突和复杂性,^① 拉动社会对法律技术与知识的需要。

由假设 2 形成下面分假设。

假设 2a: 国家的经济能力与法学院系的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 2b: 人口总量与法学院系的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 2c: 在校生规模与法学院系的成立率呈正相关。

假设 3: 制度环境假设。种群外部的制度环境会对组织成立率产生影响。当某一组织形式符合制度要求或拥有制度合法性时, 该种形式会被更多组织复制, 或采用该种形式的组织更可能成立。法学教育的制度环境主要指涉法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规则维度和认知维度。前一维度反映在法治在多大程度可以转化成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契约, 即法律。立法运动的强弱体现出了法治的力度。因为“无法可依”便谈不到法治。每一次立法, 都是对法律管辖权(jurisdiction)的扩大, 也是用法律权威替代其他竞争性权威的活动。后一维度反映在法治这一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于公共话语的程度, 即它是否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或社会事实。当我们更多地用“法律”来解释社会现象、社会问题, 更多地转向法治(法制)建设来寻求解决办法, 这些符号自然会频频出现在公共话语中, 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由假设 3 形成下面的分假设。

^① 人口压力会加快环境的恶化(Urdal, 2005), 加剧资源的稀缺性和贫困等社会问题(Meadows et al., 1972)。同时, 人口膨胀与国内暴力冲突和国家的政治压制呈正相关(Henderson, 1993)。

假设 3a:法律数量的增长对法学院系的成立率有正向效应。

假设 3b:法治话语的增长对法学院系的成立率有正向效应。

这些假设正确与否需要通过分析性统计加以验证。下文将首先介绍用以验证假设的经验数据,其次介绍统计模型。相信经过数据的验证后,形塑法学教育组织成立率的决定机制和关键性力量会显现出来。

四、数据与变量

根据假设的内容,数据收集围绕三部分展开:1. 1949 - 2012 年,中国法学教育组织历年的成立率;2. 1949 - 2012^① 法学教育组织种群历年的密度;3. 1949 - 2012 全国经济、人口、在校生规模和法治环境的历年变化。为了收集前两部分的数据,笔者参考了 1990 - 2012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设置或同意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名单》。该名单包含了 23 年中,每一年新成立法学专业的学校名称,但 1949 - 1989 年法学专业的信息则缺失。另外,笔者还参考了《中国法律年鉴》。其中包括 1949 - 1992 年全国法学教育机构数量的统计。但统计合并了本科和专科法律专业,因此只能做间接参考,不能直接用于本研究。

中国高校频繁的合并拆分对收集组织生命史数据带来了巨大挑战。为确保数据的确实性,笔者采取回溯性的收集方法,以教育部在 2012 年公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名单》为基础,搜集名单上每一个本科高校的法学教育历史。搜集步骤如下:1) 截至 2012 年,该校是否成立了本科法学专业;2) 该专业成立的最早时间;3) 成立方式——通过合并其他学校的法学专业或完全自主成立;4) 若通过合并而来,那合并前这一专业原本属于哪一学校又在何时成立;5) 如果该校的法学教育曾经停办或被取消建制,那么停止时间和复办时间分别为何。之所以关注这五点内容,原因在于“成立”、“合并”、“取消”和“复办”这四个关键的结点既构成了个体组织的生命史,也影响了组织在群体层面的总数变化。例如,清华大学法学院在 1949 年被取消,于 1952 年并入北京大学。因此,由于清华法学的变化,当年的种群规模

① 因为上一年度的种群密度影响下一年度的组织成立率,所以 1949 年的组织成立率受到 1948 年种群规模的影响,1950 年的成立率受到 1949 年种群规模的影响,以此类推。

减少一个单位,但合并的方式并不产生新组织,因此1952年的种群规模不变。同理,通过合并重庆、四川、贵州与云南大学法学教育机构,西南政法大学于1953年成立自己的法学院系,因此1953年的种群规模增加一个单位的同时也减少了四个单位。结合已列出的参考资料,笔者整理出1949-2012年法学教育组织种群规模的历年变化(见图3),以及1949-2012年法学组织历年的成立率(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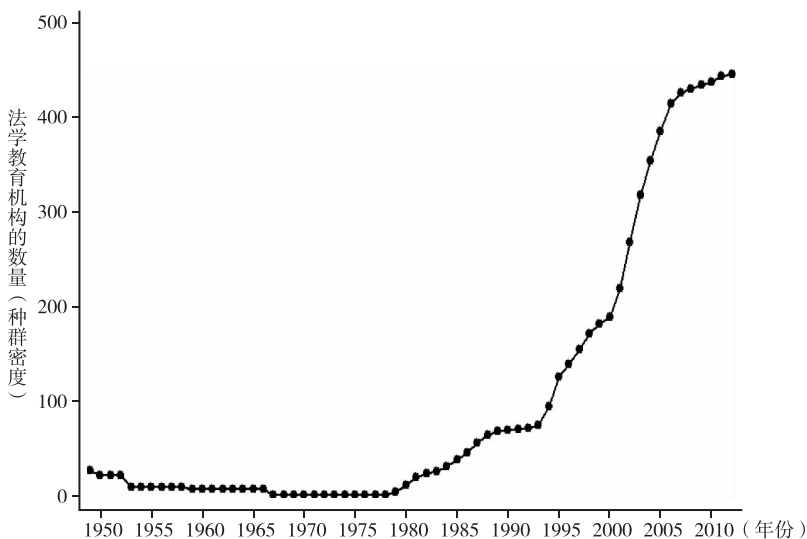


图3 1949-2012年法学教育组织的种群密度

从图3中可以看出,法学教育组织的群体密度呈S形上升趋势,可以大致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7)调整停滞期:从1949至1965年,全国本科法学教育机构的总数减少了三分之二。到文革^①结束,法学教育种群经历了长达12年的低潮期,种群密度仅为2。第二阶段(1978-1992)恢复发展期:从1978年起,法学教育开始恢复,

^① 文革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段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笔者认为,笼统的以一个历史事件(时段)来解释法学教育的变化趋势并不够。更重要的是找出文革与法学教育之间具体的、特定的联系,并考察这种联系是否仅仅存在于文革这个时段。同理,改革开放作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以何种路径影响了法学教育也值得思考。答案或许并不能止步于指出改革开放促进了法学教育,而是回答改革开放究竟代表了什么,是市场经济发展、个人权利得到尊重,还是法制体系开始健全?而这些因素贯穿于整个新中国历史,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程度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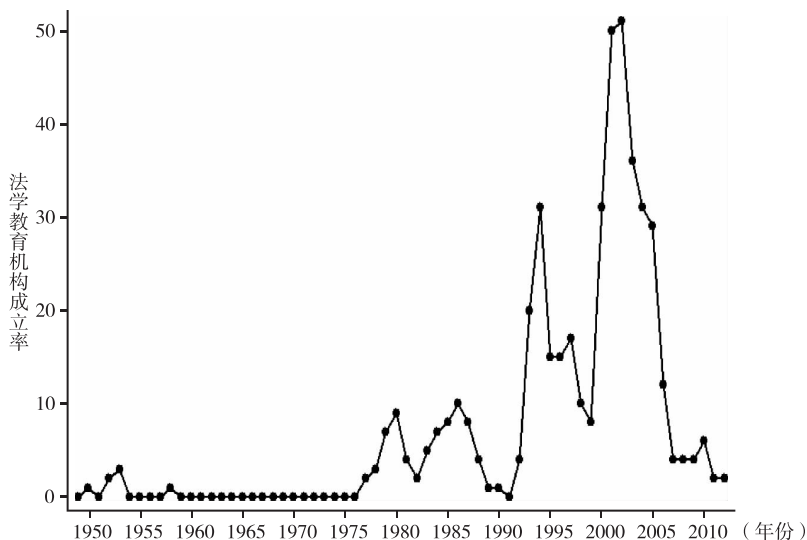


图4 1949-2012年法学教育组织的成立率

但速度较缓。每年的种群密度增加不足10个单位。1992年的种群密度较1978年增长了14倍。第三阶段(1993-1999)稳步提升期:与上一阶段相比,种群扩张的速度继续加快,年平均增加10个单位以上,最快一年增加31个单位。第四阶段(2000-2005)加速增长期:这一段时间虽不长,但种群规模的扩张速率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曲线几乎已趋向竖直。在2001-2002一年中,种群密度就增长了50个单位,仅略低于第二阶段15年的增长总和。至2005年底,该数字已是1978年的83倍。第五阶段(2006-2012)缓慢回落期:尽管种群密度总体仍在增加,但增长速率快速下降,年增加数额不足5个单位,法学教育机构这一组织群体进入了新的平台期。

从图4可以看出,自1976年后,法学院系成立率经历了4个峰值,分别是1980、1986、1994和2002年。虽然峰值间的波动很大,但仍可看出,成立率基本沿钟形轨迹变化。在1991-1994、1999-2002两个时段内,新组织大批量进入组织群体。这和图3中种群密度的变化趋势基本符合,但不完全一致。同时,虽然一直有新组织成立,但在1987-1991、1994-2000、2001-2006三个时段内,成立率的下降幅度很大。这和种群密度在三个时段的快速增长形成了对

比,说明成立率和密度二者并非衍生关系,而存在因果关系,有待检验和发现。

第三部分资料主要是1949-2012年全国社会经济、法治环境和高教发展的宏观数据。首先,笔者参考《中国统计年鉴》,得到了1950-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数据。而缺失的1949和2009-2012部分,则在《中国对外贸易史》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找到。与经济数据相比,人口数据更易获得。笔者参考《中国统计年鉴1949-2008》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2012》得到了完整的信息。其次,笔者在既有的《北大法宝》数据库中,整理出1949-2012年,历年颁布法律的数量。这里的“法律”只包括全国人大和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文件,是《立法法》意义上的法律,不包括地方性法规。最后,笔者综合了《中国教育年鉴1992-2010》、《高等教育报告2012》、^①《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概况及评估制度》^②和《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得到了1949-2012年,历年高校在校本科生总数。最后,利用《人民日报1946-2014》^③数据库,笔者整理出历年来含有“法律”、“法治”或“法制”的新闻标题,去除不适当的部分,得到这些概念出现在《人民日报》中的历年词频。

笔者根据假设,将概念变量化,并在上文介绍了每一变量涉及的经验数据。在将这些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之前,笔者将以表格的形式介绍变量的基本信息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1)。值得注意的是,经济能力与高教规模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9,这两者与人口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也很高。因此,笔者对资源依赖假设下的3个自变量做因子分析,抽取“组织环境容纳能力”这一因子。3个变量的因子负荷分别为0.95,0.67,1.03,特征值为2.43。同时,法律数量与法治话语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85,并且两者在理论上也有较强联系。因此,笔者对

① 本资料来源于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test/2013-10/29/content_2517469.htm)。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7月11日。

② 本资料来源于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http://www.heec.edu.cn/modules/zhiliangtixi_d.jsp?id=1139)。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7月11日。

③ 利用有代表性的报纸来分析公共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已经成为社会运动与文化社会学领域的一个惯例。例如,费斯与赫施通过追踪美国报纸中“全球化”这一词汇的语义变化,分析这一社会现象如何被赋予特定的含义,以及造意(sense making)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如美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等等(Fiss & Hirsch, 2005)。又如杰森和她的同事通过对比“荷兰德国与美国报纸从1955到2005年中对国外文化的报道范围”得出美国与欧洲对“外国文化”的态度取向(orientations)并不一致(Janssen et al., 2008)。

制度环境假设下的两个自变量做因子分析,抽取“制度环境”这一因子。两个变量的因子负荷分别达到0.92,0.92,特征值为1.71。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

	因变量	自变量						
		假设一:密度依赖		假设二:资源依赖			假设三:制度环境	
	1	2	3	4	5	6	7	8
	成立率	种群密度	种群密度平方/100	经济能力/1000	人口/1000	高教规模	法律数量	法治话语
样本量	64	64	64	64	64	64	64	64
取值范围	0-51	2-445	.04-1980.25	.04-243.61	5.42-13.6	.48-239.13	0-62	2-422
标准差	11.86	146	620.72	61.42	2.64	67.14	20.07	114.92
1	1.0000	.4433	.2746	.2048	.5678	.2933	.7020	.7710
2	.4433	1.0000	.9710	.9410	.7652	.9721	.7014	.7683
3	.2746	.9710	1.0000	.9793	.6548	.9942	.5365	.6252
4	.2048	.9410	.9793	1.0000	.6389	.9856	.4974	.5839
5	.5678	.7652	.6548	.6389	1.0000	.6912	.7923	.8360
6	.2933	.9721	.9942	.9856	.6912	1.0000	.5553	.6550
7	.7020	.7014	.5365	.4974	.7923	.5553	1.0000	.8544
8	.7710	.7683	.6252	.5839	.8360	.6550	.8544	1.0000

五、模型和结果分析

组织成立过程相当于事件的到达过程(arrival process)。每个组织进入族群,都相当于一次到达事件的发生(Hannan & Freeman,1987,1989; Barnett & Amburgey,1990; Ranger-Moore et al.,1991)。而研究者需要估算:在一单位时间段(t)中,一定数量的事件(y)发生的概率。它的基本模型是泊松过程。但因存在计数资料(count data)过散分布(overdispersion)的问题,我们需要放宽模型的限制,应用负二项回归模型(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它的函数形式如下:

$$\lambda_i = \exp(\pi^{t x_i}) \varepsilon_i \quad (1)$$

函数(1)服从 gamma 分布,它代表因变量可能存在的过散分布。过散分布的具体形式如下:

$$\text{Var}(Y_i) = E(Y_i)[1 + \alpha E(Y_i)] \quad (2)$$

本文中,因变量的均值(7.188)与其方差(11.864)并不相等,也存在过散分布的情况(39%的时间单位中没有事件发生)。因此笔者采用负二项分布模型来分析因变量“法学教育组织成立率”与三组自变量“种群密度”、“资源环境”、“制度环境”的关系(见表2)。

表2 种群密度、资源环境、制度环境对法学教育组织成立率的效应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假设一: 密度依赖	种群密度	.033 *** (.00)				
	种群密度的平方	-.007 *** (.00)				
假设二: 资源依赖	经济能力		-.038 ** (.01)			
	人口		.729 *** (.10)			
	高教规模		.026 * (.01)			
	组织环境容纳能力因子			.572 * (.23)		
假设三: 制度环境	法律数量				.029 * (.01)	
	法治话语				.008 *** (.00)	
	制度环境因子					1.483 *** (.16)
	常数	-.114 (.23)	-6.261 *** (.98)	1.796 *** (.22)	-.461 + (.26)	1.070 *** (.15)
	样本量	64.000	64.000	64.000	64.000	64.000
	卡方	48.740 ***	64.058 ***	7.166 **	58.143 ***	57.697 ***

注:(1)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2)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表2显示,“种群密度”、“资源环境”和“制度环境”三组变量均对组织成立率有独立作用。模型1显示,种群密度对成立率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其平方项却有显著的负效应。这一结果支持了笔者的第

一个假设,即“密度依赖假设”。结合两个系数可以推测,种群密度所代表的合法化过程虽然持续支持新成员进入组织群,但这种支持的力度逐渐下降,并渐渐被竞争过程覆盖。模型2显示,经济能力、人口与高教规模分别有显著效应,但由于三者之间存在较强的多重共线性($VIF = 28.90$),回归系数并不能说明问题。因此,笔者将三个变量结合为因子“组织环境容纳能”,加入模型3。模型3显示,该因子的正效应显著,初步支持了假设二。但从卡方系数来看,单用环境容纳能力(或资源)的增加来解释组织成立率并不令人满意。对外贸易的扩展、高校扩招和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大虽然是影响因素,但影响力有限。对比模型1和模型3我们可以发现,种群密度这一概念在解释组织成立率上更具优势。模型4检验了制度环境对因变量的作用。变量“法律数量”代表法律整体性的制度权威。统计结果显示,它对因变量有显著的正效应。颁布法律的数量也代表了法律体系在社会中的合法性。此处的合法性并非“合乎法律法规”,而是合理性,在认知上被理解为“本当如此或无需置疑”。立法的繁荣反映了人们对法律这种文化和制度的认同,认为这是维系社会运行必不可少的机制与力量。文革中立法的停滞和80年代后的迅速发展即是法律的合法性由低转高的体现。变量“法治话语”代表“法律文化”在主流话语与意识形态中占据的位置。通过考察法律与法治在语言与词汇中的变化,我们可以观察到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固化过程,因为语言本身即为文化与意识的载体(Lévi-Strauss, 1966; Sewell, 1992)。模型显示,当法治越来越多的成为“显话语”,法学院的成立速度也会越快,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笔者从“法律数量”和“法治话语”中抽取“制度环境”因子,加入模型5,结果显示,该因子正效应显著,初步支持了假设三。

在表2的统计模型里,笔者只是分别检验了三组自变量的作用,而未用嵌套模检验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新加入的变量是否仍有作用。表3将自变量依次加入统计模型,这种方式可以部分解释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即变量A是否通过变量B对因变量起作用。由于笔者所收集的是历时性数据,需要控制“时间”这个潜在的影响因素,因为无论是制度环境还是资源供给都和时间变化相关。如果要检验各个解释变量是否有单独的效应,就要控制住时间曝光效应(the effect of time

exposure)。因此,笔者将时间变量作为一个连续变量加入回归模型,^①1949年为1,2012年为64。^②

表3 法学教育组织成立率决定因素的嵌套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种群密度		.018 *** (.01)		.014 ** (.01)	-.004 (.01)
种群密度的平方		-.004 *** (.00)		-.005 *** (.00)	-.001 (.00)
组织环境容纳能力因子	-.225 (.19)			.732 * (.31)	.456 (.28)
制度环境因子			1.204 *** (.29)		1.129 ** (.44)
时间(年度)	.095 *** (.01)	.066 *** (.02)	.019 (.02)	.075 *** (.02)	.060 ** (.02)
常数	.100 (.26)	-.461 (.32)	-.267 (.30)	-.676 * (.34)	-.883 * (.35)
样本量	64.000	64.000	64.000	64.000	64.000
卡方	45.175 ***	63.000 ***	58.943 ***	68.314 ***	74.751 ***

注:(1)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2)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模型1包含控制变量“时间”和解释变量“组织环境容纳能力”。与功能主义对于教育组织的解释相悖(Atienza, 2011; Kirchheimer et al., 1987),资源供给的增多并未显著促进法学教育组织成立率的提升。这种不显著性可能源于法学教育并非惟一需要资源的组织种群,在高等教育这一组织场域内,还同时有多个竞争性种群存在,如经济学或医学。经济发展、扩招、科技复杂性会对整个高教场域产生推进作用,但对其中某一个学科的影响未必遵循同样的模式。由于资料和数据限制,笔者暂时无法把竞争性种群纳入分析,只能通过描述

① 笔者对时间变量的操作参考了费斯和赫施对长期数据自相关性的处理,以及任祖丽在分析美国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s)成立率时对时间变量的处理方法(Fiss & Hirsch, 2005; Renzulli, 2005)。

② 时间维度对于理解长时段的宏观社会变化至关重要,在许多研究中,常常加入自变量与时间段的交互变量进行考察。但本研究涉及到的时间维度为连续变量,其与自变量的交互效应呈一个3D截面,难以呈现和解释,故此处没有加入交互效应。

统计的方式尝试展现高教场域中族群发展的不均衡性。如图5所示,法学教育与医学教育在相同的历史时段呈现出大相径庭的发展趋势。^①即使在社会经济较为落后的50、60年代,医学教育也并未停滞发展,这与21世纪以来医学教育组织的低成立率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笔者认为,法学教育并非必然受惠于组织环境容纳能力的整体提升,换句话说,法学教育组织的成立速度并非环境容纳能力的直接衍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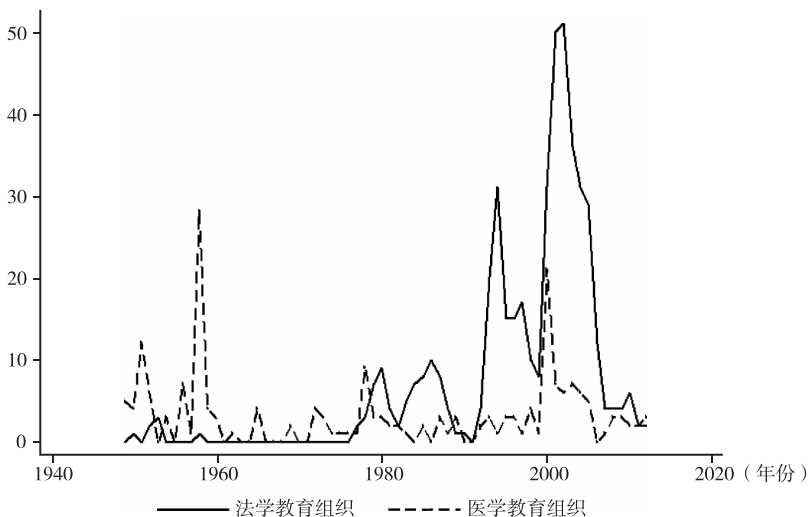


图5 1949-2012年法学与医学教育组织成立率

模型2包括控制变量和“种群密度”这组解释变量。结果显示,种群密度对因变量有着显著的正效应,随着法学教育组织种群的整体扩张,新成立组织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同时,“种群密度的平方”这一变量有着显著的负效应。通过观察种群密度及其平方项的系数,我们可以发现种群密度和组织成立率为非单调函数关系,进而支持了组织生态学对于种群密度的作用机制的假设。模型3包含“制度环境因子”这一解释变量。统计结果与笔者的假设一致,当立法环境和法治文化得到改善时,法学教育组织的成立速度也会加快,并且这种推进作用在

^① 医学教育组织成立率的数据来源与法学教育组织相同,收集方法相似。其定义范围也只包括本科大学中的本科专业。

统计上非常显著。同时,法律的权威性以及法治文化的高低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近30年,而是贯穿于法学教育的整个发展过程。^①模型4包括了种群密度、密度的平方以及组织环境的容纳能力。与模型2相比,前两个变量的作用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而与模型1相比,组织环境的容纳能力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同时模型的整体解释力增强($\chi^2 = 58.94$)。这表明,组织族群的密度可能压制(suppress)了资源供给对新组织成立速度的正效应,因为在由多学科组成的高教场域中,资源总量并不平均分配至所有学科,而是向强势学科倾斜,当一个学科本身成为显学,合法性提高时,资源的正向效应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当控制了法学教育组织群体的整体规模(合法性)时,资源增长对该学科内部新组织的成立速度才有了显著的推进作用。模型5包含了所有的变量。其中,有显著效应的变量只有“制度环境”。^②这一结果支持了笔者对于“法律权威”、“法治文化”作用的假设。

基于模型5,笔者将种群密度和组织成立率作图,希望将两者的关系直观化。如图6所示,种群密度和组织成立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当密度的变化区间在150到250之间时,组织成立率迅速飙升,而超过这个拐点后,成立率迅速下降。当密度在310-350之间变化时,组织的成立率稳定在35左右,而当密度超过370,成立率迅速回落,几乎低至组织群体的形成初期。目前法学教育机构的种群密度已经超过400,处在组织群演变的尾期,因此,根据曲线推测,成立率会继续下降,直至一个稳定的低点。

此处,笔者还将结合部分高校成立法学院的过程具体说明制度环境与种群动力机制怎样支持了新组织的发展。首先,以清华大学为例。1995年,清华大学建立法律学系,并于1999年升格为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在回顾清华大学法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时,指出,“为适应社会主义

① 笔者将“文革1966-1977”、“文革前1949-1965”作为两个时间哑变量加入模型3,结果显示制度环境在 $p < 0.001$ 层面上显著,系数为0.88。同时,笔者也尝试把“文革1966-1977”这一变量和连续性的时间变量一齐加入模型,结果与表三一致,仅仅在模型5(full model)中,制度环境因子的显著程度略有下降,但仍然显著。其他变量均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侧面证明仅仅以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段来解释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存在不足。研究者应该进一步发掘不同历史时段之间的差异究竟代表了什么。

② 同时,笔者要对其他变量的变化做出解释。变化发生的最主要原因是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四个自变量的vif值均超过7,平均达到61.01。其中,多重共线性最明显的为种群密度(vif=130.87)和密度的平方项(vif=93.75)。当将平方项移出模型,多重共线性的强度大大减弱(mean vif=6.71)。种群密度则重新恢复显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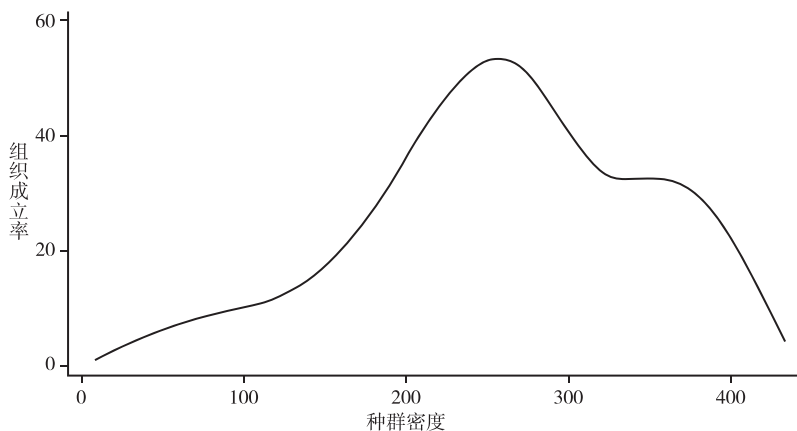


图6 种群密度对组织成立率的作用(基于表3模型5的估计)

法治建设的需要,配合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综合大学的战略布局,1995年9月清华大学正式恢复建立法律学系……法治关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没有法治,就没有现代化。建设法治必须从法学教育入手,没有高质量的法学教育,就不可能有健全的法治……我们的使命是“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确立和完善而努力,为人类和平发展做贡献”。^①对于“法学教育顺应社会法治需求”的强调还可见于清华大学法学院院史^②与校长在2005年庆贺法学院成立10周年所发贺电当中。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制度环境的改善给予了法学教育机构很强的合法性身份,这种身份并不单纯指“契合政治性的意识形态”,也有极强的“社会正当性”,即把法治—社会进步—法学教育三者联系为一个牢不可破的循环,法学教育既是社会进步的需求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手段。第二个例子来自天津师范大学。1980年,天津师范大学开设法学专业并招收本科生。该专业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服务中国地方法治建设”^③为宗旨,同时以“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

① 本资料来源于清华大学网站(<http://www.law.tsinghua.edu.cn/publish/law/3238/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9月29日。

② 请见清华大学网站(<http://www.law.tsinghua.edu.cn/publish/law/3240/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9月29日。

③ 本资料来源于天津师范大学网站(<http://www.tjnu-law.com/index.asp>),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9月30日。

念,品德端正,业务优良的以法律服务为主的应用型专门人才”^①为目标。在该校法学教育的成立阶段,来自组织群体内部的帮助起到了很大作用,即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协助。同样强调族群内部帮助的还有同年成立的郑州大学法学专业和1984年成立的烟台大学法律系。在成立之初,郑州大学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机构调入了近30名法学教师,^②而烟台大学法学专业则由北京大学法律系直接援建。^③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族群规模与能力的提高(尤其在族群扩张的初期)会便于潜在的组织行动者动员资源、吸取经验,从而加快新组织的成立速度。

六、结 语

基于中国法学教育机构1949-2012年连续64年的生命史数据,本文分析了影响法学教育组织成立率的相关因素。首先,笔者强调,法学教育组织嵌入在三重环境即资源环境、种群生态和制度环境中。其中种群生态对组织成立率的影响至关重要。种群密度作为组织群体中的动力机制形塑着组织成立速度的快慢节奏,使其呈倒U型曲线变化。在组织群体发展的初期,种群密度的升高代表了该种组织身份和形式的合法性,会快速促进新组织的成立。而随着密度达到拐点,组织对资源的竞争激烈化,留给新组织的空间越来越小,该种群会进入缓步发展的中尾期。笔者将组织群体层面的“合法性效应”和“竞争效应”带入法学发展的动力学研究,弥补了该领域既有研究理论性不足的缺陷。同时,利用生命史数据,笔者刻画出两种效应在法学教育中的时间周期,即把组织种群密度与组织成立速度精确化。该类量化分析有助于法学界进一步讨论“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这一关键性议题,并对制定“整合法学教育”等战略提供一定的依据。

① 本资料来源于天津师范大学网站(http://www.tjnuzsbs.com/faculty_file1.php?id=20&num=1),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9月30日。

② 本资料来源于《郑州大学法学院历史沿革》(<http://baike.baidu.com/view/85855.htm>),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9月30日。

③ 本资料来源于烟台大学网站(<http://www.law.ytu.edu.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lists&catid=10>),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9月30日。

其次,通过把质性的文本材料量化,笔者测量并检验了“组织制度环境”中的一个关键维度——话语与文化维度——对于组织成立率的作用。借助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多重概念化,笔者希望丰富组织生态学对于制度环境的思考,尤其是“制度环境”如何透过“非资源渠道”对教育组织产生作用。未来则可以补充更多的质性研究,深入个体的组织层面,了解制度性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组织的行为,把组织环境、组织群、组织个体,这三个层次连接起来。同时,组织生态学对教育组织的研究,多集中于美国以及松散型的教育体系,以中国作为案例,则检验了该视角对集中型教育体系的有效性。

再次,通过考察资源依赖与法学教育的联系,笔者指出,泛泛而谈“经济发展”、“高校扩招”对于法学教育组织的影响可能存在偏误。因为高等教育领域同时存在多个组织种群,而种群之间也存在着资源竞争。遗憾的是,由于资料限制,笔者没能将其他学科的组织种群纳入分析范围,尽管在理论上,这些竞争性种群对于法学教育组织存在共时性影响。笔者希望,以本文为引,研究者可以将学科发展与组织环境结合在一起,在多个层面讨论发展的动力机制,丰富组织生态学在高教研究中的应用。

参考文献:

- 陈伟华,2010,《理工类高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第3期。
- 董志峰,2008,《“复合型,应用性”法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11期。
- 符启林,2007,《中国法学教育的过去、现状与未来》,《太平洋学报》第6期。
- 付子堂、周祖成,2006,《新世纪中国法学教育的转型与趋势》,《太平洋学报》第7期。
- 郭国泰,2006,《软件商业生态系统中利基者经营模式之变迁:以资讯安全软件公司为例》,“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博士论文。
- 霍宪丹,2003,《法律职业与法律人才培养》,《法学研究》第4期。
- ,2001,《面向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问题思考》,《岳麓法学评论》第2期。
- 李国荣,2009,《当代大学生就业现状及对策研究》,《管理观察》第2期。
- 李龙,2000,《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发展研究报告: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与未来》,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2,《我国法学教育急需解决的若干问题》,《中国高等教育》第7期。
- 李龙、邝少明,1999,《中国法学教育百年回眸》,《现代法学》第6期。
- 李仁玉、张龙,2010,《我国现行法学本科教育问题的对策》,《中国大学教学》第4期。
- 戚桂芳、袁雪,2009,《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经济研究导刊》第21期。
- 任丹红、王国梁,2007,《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及法学教育改革》,《江南大学学报(教

育科学版)》第2期。

- 孙国祥、张书琴,2009,《中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矛盾性展开与破解》,《当代法学》第2期。
- 孙玉琴,2008,《中国对外贸易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汤能松,1995,《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北京:法律出版社。
- 杨振山,2000,《中国法学教育沿革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
- 汪习根,2001,《论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政治与法律》第1期。
- 姚植兴,2007,《法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困境与出路》,《中国大学生就业》第15期。
- 冀祥德,2010,《对中国法学教育全面反思与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
- 于丽英、范静怡、田建设、陈志红、赵晓海,2011,《法学教育中法学文献信息保障体系研究——以北京地区高校为考察对象》,《法律文献信息与研究》第2期。
- 张文显,2005,《面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教育》,北京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报告。
- 周守伦,1995,《法学教育与市场经济》,《现代法学》第5期。
- Aldrich, Howard & Ellen R. Auster 1986, "Even Dwarfs Started Small: Liabilities of Age and Size and Their Strategic Implication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8.
- Amburgey, Terry L. & Hayagreeva Rao 1996, "Organizational Ecolo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irection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
- Atienza, Soledad 2011, "Evolution of Legal Education in Spain."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61.
- Audia, Pino G., John H. Freeman & Paul Davidson Reynolds 2006, "Organizational Foundings in Community Context: Instruments Manufacturer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1(3).
- Berger, Peter L. & Hansfried Kellner 1981, *Sociology Reinterpreted: An Essay on Method and Vocation*. Doubleday Garden City: Anchor Press.
- Barnett, William P. & Terry L. Amburgey 1990, "Do Larger Organizations Generate Stronger Competition?" In J. V. Singh (ed.), *Organizational Evolution: New Direc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 Baum, Joel A. C. & Oliver Christine 1992,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and the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Popu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4).
- 1996, "Toward an Institutional Ecology of Organizational Found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
- Bruderl, Josef & Rudolf Schussler 1990,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 The Liabilities of Newness and Adolescen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5(3).
- Burns, Lawton R. & Douglas R. Wholey 1993, "Adoption and Abandonment of Matrix Management Programs: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6(1).
- Carroll, Glenn R. 1981,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Expansion in National Systems of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5).
- 1985, "Concentr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Dynamics of Niche Width in Populations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6).
- 1987, *Publish and Perish: The Organizational Ecology of Newspaper Industries*.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Delacroix, Jacques & Glenn R. Carroll 1983, "Organizational Foundings: A Ecological Study of the Newspaper Industries of Argentina and Irel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8(2).
- DiMaggio, Paul J. & Walter W.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
-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obbin, Frank 1994, "Cultural Models of Organizati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ational Organizing Principles" In Diana Crane (e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Emerg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Fiss, Peer C. & Paul M. Hirsch 2005, "The Discourse of Globalization: Framing and Sensemaking of An Emerging Concep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 (1).
- Galaskiewicz, Joseph 1985,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1.
- Goes, James B. & Seung Ho Park 1997, "Interorganizational Links and Innovation: The Case of Hospital Servi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0 (3).
- Hannan, Michael T. & John Freeman 1977,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5).
- 1984, "Structural Inertia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2).
- 1986, "Where Do Organizational Forms Come From?" *Sociological Forum* 1(1).
- 1987, "The Ecology of Organizational Founding: American Labor Unions, 1836 - 198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4).
- 1988, "The Ecology of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 American Labor Unions, 1836 - 198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
- Hassard, John 1995, *Sociology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Positivism, Paradigms and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A.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nderson, Conway W. 1993, "Population Pressures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4 (2).
- Janssen, Susanne, Giseline Kuipers & Marc Verboord 2008,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Arts Journalism: The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of Arts and Culture Coverage in Dutch, French, German, and U. S. Newspapers, 1955 to 2005."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 (5).
- Jepperson, Ronald L. & Ann Swidler 1994, "What Properties of Culture Should We Measure?" *Poetics* 22 (4).
- Kirchheimer, Otto, Franz Leopold Neumann & Keith Tribe 1987,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Press.
- Lévi-Strauss, Claude 1966, *The Savag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rrett, Cora Bagley 1980, "Influences on the Rise of New Organizations: The Formation of Women's Medical Societ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5(2).
- Meadows, D. , D. L. Meadows, J. Randers & W. W. Behrens 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 Meyer, John W. 1980, "Institutional and Technical Source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xplaining

- the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Project Report,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Finance and Governance.
- Meyer, John W. & Brian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2).
- Nielsen, François & Michael T. Hannan 1977,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s: Tests of a Population Ecology Mod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3).
- Nownes, Anthony J. 2004,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Interest Group Formation: Mobilizing for Gay and Lesbian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0–98.”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1).
- Pfeffer, J. & Gerald Salancik 1978,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Perrow, Charles 1986, *Complex Organizations, A Critical Essay*. Glencoe, IL: Scott, Foresman.
- Ranger-Moore, James, Jane Banaszak-Holl & Michael T. Hannan 1991, “Density-Dependent Dynamics in Regulated Industries: Founding Rates of Banks and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1).
- Renzulli, Linda A. 2005,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and the Emergence of Charter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8(1).
- Scott, W. Richard 2008,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s*. Los Angeles, Calif.: Aufl.
- Sewell, William H. Jr. 1992,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1).
- Singh, Jitendra V. & Charles J. Lumsden 1990, “Theory and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Ec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
- Tucker, David J., Jitendra Singh, Agnes G. Meinhard & Robert J. House 1988, “Ec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Change in Organizational Populations.” In G. R. Carroll (ed.) *Ecological Models of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MA: Ballinger.
- Tucker, David J., Jitendra V. Singh & Agnes G. Meinhard 1990, “Organizational Form,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 Founding Patterns of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3(1).
- Urdal, Henrik 2005, “People vs. Malthus: Population Pressur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Armed Conflict Revisited.”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2(4).
- Zucker, Lynne G. 1989, “Combining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Population Ecology: No Legitimacy, No Hist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4).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杨 典